

诗坛骄子，思想巨人

——儒家思想下的陶渊明与杜甫论析

白彬彬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陶渊明和杜甫作为中国文化史上两个符号式的人物, 虽然在诗歌创作风格上差异颇大, 但却其思想来生活, 却共同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深浸润。无论是进退出处的人生理想, 还是真淳深挚的人伦品格, 再或者是民胞物与的人道境界, 陶、杜皆身体力行, 矢志不渝。伟大的思想造就了伟大的诗人, 伟大的诗人孕育了伟大的诗篇, 可以说, 陶渊明与杜甫不单是依靠着他们的诗文作品打动了万千读者, 更是凭借着他们思想深处积淀的深厚儒学修养而泽被后世, 他们不仅是诗世界的骄子, 更是思想国的巨人。

关键词: 陶渊明; 杜甫; 儒家思想; 民胞物与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639 (2016) 02-0028-07

陶渊明与杜甫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两位杰出的诗人, 似乎彼此并无太多太深的关联: 两人不仅在时间先后上有着三百多年的间隔, 而且陶渊明平淡隽永的田园诗也与以“沉郁顿挫”风格著称的杜诗迥然有异。但是透过这种表面的差异, 这两位同为不朽的诗人却在更深的层面相遇了, 这更深的层面即二人同在儒家思想熏陶下形成的人生理想、人伦品格、人道境界。

关于陶渊明的思想, 前贤时修所论夥矣, 但毋容置疑, 他是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的。无论是他夫子自道式的“少年罕人事, 游好在六经”(《饮酒》), 还是后来人对他的评价, 如清末钟秀所言“陶公乃儒者耳”, 都可以看出在他身上浸染儒家思想的明显痕迹。杜甫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儒者, 如他自称的“乾坤一腐儒”(《江汉》)、“腐儒衰晚谬通籍”(《题省中壁》)、“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等, 虽然语气中充满了牢骚不平, 但细细品味, 实则都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自身儒者身份的认同。本

文试将陶渊明、杜甫两人同置于儒家思想的关照之下进行考察, 以探讨他们之间共同的人格魅力和人生旨趣。

一、儒家的人生理想：进退出处之间

儒家思想中蕴藏着深刻的人生智慧, 直接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这其中既包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性, 也不乏君子相机而动的灵活性, 二者相互补充, 相得益彰。关于儒家入世的表述, 如“鸟兽不可与同群, 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天下有道, 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等。关于出世的一面则如“道不行, 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 在《先进篇》中, 孔子也对曾皙“浴乎沂, 风乎舞雩, 咏而归”的描述发出了“吾与点也”的赞叹, 流露出这位席不暇暖、到处奔走的儒家始祖对自由境界的向往。那么儒家在进退出处之间是如何转换的呢? 在

收稿日期: 2015-12-20

作者简介: 白彬彬(1989-), 安徽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中国古典文学专业2013级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泰伯篇》中，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可见，儒家是依据道之有无来决定自己的行止的。当道行于天下之时，人们应该努力作为，成就一番功业，而一旦天下无道，人们则应该隐藏起自己，避免卷入到污浊的社会现实中去。

陶渊明生活在晋末宋初，那是一个兵连祸结的动荡时代，是典型的无道之世，尤其是晋宋“禅位”之际，整个统治阶级上层充斥着阴谋和杀戮，令人不忍直视。《南史·隐逸列传·陶潜传》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夫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梁肉，麾而去之。

作为刘宋政权的佐命元勋，檀道济劝勉陶渊明所说的一番话，显然来源于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思想，其凸显的前提即是当今乃有道之世。对此陶渊明显然是不以为然的，他内心深处清楚地知道现实是怎样的污浊不堪，但是他又不可能对着檀道济这样的权臣直陈时弊、针砭现实，于是只好把隐居不出的原因归结在自己身上。将檀所馈梁肉“麾而去之”的果决行为，更直接表明了陶渊明对污浊现实坚决不屈的刚烈。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系此事在元嘉三年（426）陶渊明62岁时，这表明了陶渊明晚年的人生旨趣。

其实在生活的早期，陶渊明对现实也曾抱有過一番希望。在《杂诗》十二首其五中他回忆少年志趣：“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在《拟古》九首其八中他也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这都表现了其早年的积极入世心态。陶渊明在其一生中曾有过数次出仕的经历，比如他曾先后出为州祭酒、桓玄军幕、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和彭泽县令。除担任州祭酒和彭泽县令外，其它三次仕宦经历尤为引人注目，陶渊明投身于桓玄、刘裕这些左右时局的人物幕下，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充分表明了陶渊明并不是一个自甘寂寞的碌碌庸人。袁行霈在《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中说：“总之，陶渊明虽然是一个本性恬静的人，但毕竟也像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一样，怀有

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壮志。在晋末政治最动荡的时期，他自愿地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做了几番尝试，知道已不可为，才毅然归隐。他在政治斗争中当然不是一个风云人物，但在政治风云中却也不甘寂寞。”^{[1]90} 回顾陶渊明一生大端，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是沿着准备入世——积极入世——痛苦徘徊——悠然出世这一人生轨迹进行的，其背后所依托的正是儒家进退出处的思想资源。

杜甫与陶渊明类似，其人生轨迹也经历了大致的四个阶段。首先是青年时期为入世所做的积极酝酿。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他深情回忆：“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对此，仇兆鳌注曰：“此叙少年自负，申言儒冠之事。”^{[2]74} 诗句展现于我们面前的正是一位踌躇满志的少年英才形象，这表现了青年杜甫准备入世的迫切心情。然而杜甫在仕途上不仅未能“立登要路津”，反而历经波折。在遭受了两次科举失利的打击后，杜甫经历了一段“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经过一番奔波游走之后也仅仅只得到了河西尉的卑职。杜甫在《官定后戏赠》中说：“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折腰”正是发生在陶渊明身上的故事，在此杜甫清楚地表现了对陶渊明的情感认同。由于不愿任职，朝廷就改授杜甫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但这仍只是个负责管理兵甲器械的低级官职。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又先后担任过左拾遗、华州司空参军这样的官职，但同样是艰辛备尝^[3]。在遍尝仕宦艰辛的过程中，杜甫也对早年的信仰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乾元二年（759）所做的《立秋后题》中他说：“日月不相饶，节序昨夜隔。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拘形役”来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一句。王嗣奭评价说：“余谓此诗，乃公转念以后一味有高蹈志也。”^{[2]544}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以后的十多年中，虽然曾被朝廷征召为官，但已经绝意仕进的杜甫再也没有在朝廷担任一官半职。在生命最后的十余年里，杜甫辗转漂泊于秦州、同谷、成都、夔州、湖南各地，流落终

生。在成都期间，杜甫度过了一段相对安闲的生活，浣花溪畔、黄师塔前、丞相祠里都留下了他流连的身影，此期他的许多诗作颇有陶诗闲逸的风格。如《春日江村》：“农务村村急，溪流岸岸深。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茅屋还堪赋，桃源自可寻。艰难昧生理，漂泊到如今。”“桃源”为陶渊明虚构的桃花源世界，“自可寻”表明此时杜甫已经在不期然间达到了这样的生活状态。再如《漫成二首·其一》：“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渚蒲随地有，村径逐门成。只作披衣惯，常从漉酒生。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只作披衣惯，常从漉酒生”两句，仇兆鳌注曰：“本陶潜。据陶诗云：‘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已时。’此兼举之，盖欲与渊明同调，不屑与俗客为伍也。”^{[2]797}仇注准确地揭示了杜甫与陶渊明之间人生旨趣上的同调。以客居成都为代表的晚年可视为杜甫的悠然出世阶段。

儒家的人生理想强调进退出处有由、用舍行藏在我，所谓“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是也。作为深受儒家思想沾溉的伟大诗人，陶渊明和杜甫的人生道路比较明显地经历了准备入世——积极入世——痛苦徘徊——悠然出世四个阶段，在这一点上他们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二、儒家的人伦品格：亲情友情之间

儒家把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种人际关系归纳为“五伦”，提倡夫妇互相爱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义臣行、交友以信的品德，以期实现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整个社会和谐安定的良好局面。在“五伦”中，君臣关系因为更多受到君主的主导，作为臣子往往只有被动接受的命运，所以本文在进行相关论述时仅略为提及。在其他四组关系中，夫妇、父子、兄弟都可以归入亲情之中，朋友则可归于友情之列。与道家、释家淡化甚至刻意消除人伦相比，儒家着重强调了人伦的意义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比如在《微子篇》中，子路说：“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在《论语·学而篇》中，子夏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孔子自己也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总之，对人伦的强调和重视

构成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陶渊明对儒家文化的吸收，其重心，更确切地说是将之化入生命血液的主要不是儒家的政治学说，而是伦理道德学说。他对伦理道德学说的吸收也不是机械的，而是将之改造成为更具自然色彩的人际依恋和终极关怀。”^{[4]93}陶渊明在其诗文作品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位深情绵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评价陶渊明确说：“孝惟义养，道必怀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陶渊明身上洋溢着儒家人伦品格的光辉。关于陶渊明的忠君品格，《述酒》一诗有明显体现。南宋汤汉注此诗曰：“诗辞尽隐语，故观者弗省，独韩子苍以山阳下国一语，疑是义熙后有感而赋。予反复详考而后知为零陵哀诗也，因疏其可晓者以发此老未白之忠愤。”^{[5]96}汤汉拈出“忠愤”二字来概括《述酒》主旨，充分彰显了陶渊明的忠君品格。在《和刘柴桑》中陶渊明确说：“直以亲旧故，未忍言索居”，有论者指出此二句体现了他的人生情怀^[6]，这人生情怀其实就是人伦品格。陶渊明的亲情主要灌注在写给儿子和弟、妹的作品中，如《与子俨等疏》《悲从弟仲德》《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等。《与子俨等疏》作于陶公晚年，是一位历经沧桑的父亲的书信，文字朴实、感人至深。陶公因为“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而辞官归田，作为一个热爱自由的个体，他是满含喜悦的，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的人生抉择在现实生活中带给孩子们的却是沉重的苦难。“僂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米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说出这些话时，我们仿佛可以联想到陶渊明当时低缓的语气和凝重的神情，这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深深的歉疚和怅惘，浓浓的父子亲情令人动容。《祭程氏妹文》一文则哀悼与自己一起长大的亡妹。文中两处环境描写尤为感人：“寒来暑往，日月寢疏。梁尘委积，庭草荒芜。寥落空室，哀哀遗孤。”“黯黯高云，萧萧冬月。白雪掩尘，长风悲节。”在此，一种悲戚、肃杀的氛围被渲染得淋漓尽致。祭文最后连续五个问句更是把悲剧的氛围推向了高潮：“如何一往，终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时复践？藐藐孤女，曷依曷恃？茕茕游魂，谁主谁祀？奈何程妹，于此永已？”对生死的疑惑，对死者的牵挂，对亡妹无尽的哀思都

在这五个问句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展露。

亲情是由先天血缘决定的，友情则是后天形成的，陶渊明由于其高尚的人格魅力收获了珍贵的友情。陶渊明的忘年交颜延之在他死后所做的《陶征士诔》中深情地怀念起这位挚友：“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实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迕风先蹶。身才非实，荣声有歇。观音永矣，谁箴余阙？呜呼哀哉！”“延之笔下的渊明，神情‘愀然，中言而发’；对现实政治动态是密切关注，对朋友提出告诫是直言不讳。这样严肃认真的陶渊明形象，似乎是在其诗文及记中所未见，令人感到有些陌生，似乎与悠然飘逸的陶渊明形象有些不合；但又令人感到熟悉亲切，这正是作为士的陶渊明形象的真实一面。”^[7]对于孔子所追求的“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人伦境界，陶渊明确实做到了。

关于杜甫的忠君思想，宋代苏轼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苏轼的话后来被普遍接受，“一饭未尝忘君”遂成为杜甫忠君的盖棺论定。杜甫在诗文中表现亲情的地方有很多，且感情真挚，富有动人的艺术魅力。如《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懵懂无知的儿女和闺中独看的妻子形象在素月银辉和香雾清露中仿佛被定格，显得分外动人。再如《月夜忆舍弟》：“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在皎洁的月夜，戍鼓和雁声更牵动了诗人的思绪。《杜臆》：“闻雁声而思弟，乃感物伤心。今夜白，又逢白露节候也。故乡明，犹是故乡月色也。公携家至秦，而云无家者，弟兄离散，东都无家也。”周篆之《新注》评曰：“伤心折肠之语，令人读不能终篇。”其他如《得舍弟消息二首》《遣兴》《元日寄韦氏妹》《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等，皆抒发了老杜深挚真淳的亲情。

在亲情的各类表达中，父子之情在杜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杜集中，有《宗武生日》《忆幼子》《遣兴》《得家书》《北征》《彭衙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羌村三首》等多首作品涉及到了父

子亲情，在这些诗歌里，杜甫作为一位慈爱父亲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如《忆幼子》：“骥子春犹隔，莺歌暖正繁。别离惊节换，聪慧与谁论。涧水空山道，柴门老树村。忆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轩。”杜甫有两个儿子：宗文和宗武，从对两个儿子的起名上就可以看出杜甫对他们寄寓的厚望。“骥子”是小儿子宗武的小名。《北史》载：裴宣明的两个儿子景鸾、景鸿，都很有才华，河东人称呼景鸾为骥子，称呼景鸿为龙文。杜甫以骥子为儿子小名，也见其殷殷期盼之意。全诗除“聪慧与谁论”一句直接夸奖外，无一语正面道及对幼子的想念，但耳中所闻、眼中所见、心中所感无一不由思子所引发，百无聊赖的情感背后正是难掩的父子亲情。不仅如此，在《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类表现重大主题的作品中，杜甫也不失时机地穿插进了对父子亲情的描写。如《北征》中两段文字：“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缀才过膝。”“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籍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瞋喝。”前一段叙战乱景象，通过子女的穿着来表现战争给百姓生民造成的灾难，小中见大，怜惜之情溢于言表。后一段文字表现了小儿女不识愁苦、天真烂漫的情态，显然是从左思《娇女诗》中汲取了养分，疼爱之意也是不言而喻的。

在讨论人伦品格时，值得我们留意的还有杜甫那为数众多的表现友情的光辉诗篇，这些作品犹如珠含蚌中、玉润蓝田，充分彰显了杜甫独特的人格魅力。杜甫和李白的友谊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友谊之一，闻一多先生认为，李杜的相遇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并把这次相遇比作“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唐诗杂论·杜甫》）。在集中，杜甫写给李白或者提到李白的作品有13首之多，且大多是情致深婉、流传后世的名篇。在《饮中八仙歌》所绘八人中，李白的形象最为传神，诗人写道：“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以“酒中仙”定义李白，可谓慧眼独具，表现出杜甫和李白的相知之深。再如《梦李白》：“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江

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因久无友人消息以至于梦中相见，这足可见出思念之深、情感之真。李白因卷入永王璘案而被投于囹圄，此时世人不仅未能施以援手反而落井下石，唯有杜甫坚信李白的清白并对他的遭遇给予深切的同情，在另一首《不见》中他说“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此诗中，“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二句尤为感人，它是杜甫对才华横溢的李白不幸遭遇的慨叹，同时也可以看作是诗人自伤身世的悲鸣，在这个层面上，杜甫与李白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也。

宋人张戒《岁寒堂诗话》（卷六上）有语：“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诸人，思无邪者，惟杜子美、陶渊明耳，余皆不免落邪思也。”梁启超则认为陶渊明是“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同时又认为杜甫是千古“情圣”，或许梁启超已经意识到天下两位最至“情”的诗人间的微妙关系。正是因为有了厚重的人伦品格，陶渊明和杜甫才具有了不朽的人格境界，陶诗和杜诗才具有了永恒的艺术魅力。在恪守儒家人伦品德方面，陶渊明和杜甫皆不遗余力，身体力行。

三、儒家的人道境界：民胞物与之间

北宋大儒张载（1020~1077）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所谓“民胞物与”即人道境界，这直接继承自儒家元典，在《周易》《尚书》《论语》《中庸》《孟子》等儒家早期典籍中对此都有明确的表述。如《周易·乾·彖词》：“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所谓“各正性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指的是“每一个体生命自己决定自己生命正当地生存发展”，“每一个体生命不仅自由生存发展，而且不受亦不施奴役迫害扭曲，而且利他、互利、互助以共同地和谐

地自由生存发展”。《孟子·尽心上》中也说：“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孙奭疏曰：“是则先亲其亲而后仁爱其民，先仁爱其民然后爱育其物耳。”以这样的思想为逻辑起点，那么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万物之间都是平等的，都应该互相关爱，这正是人道境界的表现。

陶渊明具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对于儒家的人道境界，陶渊明也在不经意间践履其中。陶渊明做彭泽县令期间曾派遣了一个“力”回家帮忙，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作为父亲，关怀自己的子女是人之常情，但是陶渊明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够“不独亲其亲”，进而做到推己及人。他在顾惜自己子女的时候，还能够想到所遣之“力”也是别人家的子女，也是父母所养，也应该得到顾惜——在此，陶渊明眼中所见是一个平等的人，而绝不是什么卑贱的奴仆。陶渊明的人道境界不仅体现在人际之间，而且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陶诗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自然景物的传神表现，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陶渊明在与大自然的交往中所达到的人道境界。陶渊明和谢灵运的山水田园诗经常被人们拿来比较，人们在分析他们之间诗歌的差异时通常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着眼，陶渊明的写景往往被认为是能够做到遗貌取神，富有韵外之致，而谢诗中写景一般是不遗余力的细致刻画，力求逼真地再现自然。其实，除了艺术表现手法的不同外，我想这更与他们两人对待自然的态度紧密相关。陶渊明在面对大自然时不是抱着谢灵运式的旁观者姿态，而是把全幅身心投入其中，因此他笔下的自然就不像谢灵运那样客观、疏离，而是呈现出亲密与和谐。在陶渊明的世界中，草木鱼鸟、山川风云都成为他平等交往的朋友，都成为他汲取诗意的素材。比如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中所写：“鸟弄欢新节，冷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在《与子俨等疏》中也说：“少学琴

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在此，陶渊明仿佛化身为自然之子，鸟的鸣唱、风的吹拂和麦苗的翩翩起舞都能使他获得愉悦的感受，这种“胞”，杜集中表现此种人道境界的诗歌俯拾即是。如《又呈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清人卢德水评说道：“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导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音蔼如也。”（《读杜私言》）卢氏此评掘发出杜甫的仁者之心，诚为不刊之论。杜集中有这样一组诗，诗的写作对象为仆人隶役，其中包括《示獠奴阿段》《信行远修水筒》《课伐木并序》《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刈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等。如其中《信行远修水筒》一首：“汝姓不茹荤，清净仆夫内。秉心识本源，于事少凝滞。云端水筒诉，林表山石碎。触热藉子修，通流与厨会。往来四十里，荒险崖谷大。日曛惊未餐，貌赤愧相对。浮瓜供老病，裂饼尝所爱。于斯答恭谨，足以殊殿最。诤要方士符，何假将军佩。行诸直如笔，用意崎岖外。”据《课伐木并序》可知此处信行为隶人。杜甫豪不吝惜对信行的赞美，以“清净”形容之，仇注曰：“公以此观僮仆，何等深心。”“日曛惊未餐，貌赤愧相对”两句写诗人见到辛劳了一天的信行时的感激和愧疚心理，语短情深，饱含温情，申涵光曰：“‘日曛惊未餐，貌赤愧相对’，体恤下情如是，真仁者之用心。陶公云‘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两贤一辙。”^{[21]311}“仁者之用心”正是此组杜诗的主旋律。“物，吾与也”，杜诗中有很多以动植物命名的作品，这种现象在他人的诗集中并不常见，构成了杜集独特的景观，如《鸚鵡》《孤雁》《鷓鴣》《猿》《鹿》《鸡》《黄鱼》《白

感受所依凭的正是陶渊明民胞物与的人道境界。

一部杜集，不仅是文学世界中的琳琅，也是思想宝库中的珠玉。有学者评价杜甫“全幅人生是仁的境界”^[9]。“仁者，爱人”，爱人即潜在地包含爱一切人，珍惜一切生命，此即为人道境界。“民，吾同小”。梁权道把这八首诗系在大历元年（766），杜甫在夔州时所作，在这组诗里杜甫的仁者之心、人道境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袒露。《白小》诗写道：“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细微沾水族，风俗当园蔬。入肆银花乱，倾筐雪片虚。生成犹拾卵，尽取义何如。”白小是银鱼的一种，夔州当地风俗以之为菜蔬，肆意取用，对此，富有仁者之心的杜甫心存怜惜。《杜臆》评价说：“此诗起结，蔼然有万物一体之念。物虽细微，同沾水族，乃俗当园蔬，用之贱矣。乱肆倾筐，取之多也。但此群分之命，亦属造物生成，今犹拾卵而尽取之，有伤于义矣。”再如乾元二年（759）所作《病马》：“乘尔亦已久，天寒关塞深。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毛骨岂殊众？驯良犹至今。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此诗立意本自《淮南子》中田子方之事，《淮南子·人间训》载：“田子方见老马于道，喟然有志焉。以问其御曰：‘此何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罢而不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贪其力，老而弃其身，仁者弗为也。束帛以赎之。’”在此，“仁者弗为”可看作是田子方故事和杜甫《病马》诗的主旨，“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二句充分展现出杜甫思想中一种深沉悲悯的人道境界。

陶渊明和杜甫在思想层面深受儒家的浸润，他们进退出处，依照着儒家“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道路；他们温柔敦厚，恪守着儒家重视人伦的品格；他们深具仁者心性，不期然而臻于儒家“民胞物与”的人道境界。陶渊明和杜甫，作为中国文化史上两个符号式的人物，不仅仅依靠他们的诗文作品打动了万千读者，更是凭借他们思想深处积淀的

深厚儒学修养而泽被后世。可以说，他们不仅是诗界的骄子，更是思想国的巨人！

参考文献：

- [1] 袁行霈. 陶渊明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2] (清)仇兆鳌. 杜诗详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3] 邓小军. 杜甫疏救房琯墨制放归鄜州考[J]. 杜甫研究学刊，2003，(1).
- [4] 李剑锋. 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 [5] 宋汤汉，注. 陶靖节诗[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 [6] 马银华. 直以亲旧故，未忍言索居——论陶渊明的人间情怀[J]. 山东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4).
- [7] 邓小军. 陶渊明政治品节的见证[J]. 北京大学学报，2005，(5).
- [8] 邓小军. 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 [9] 邓小军. 杜甫：全幅人生是仁的境界[J]. 四川师大学报，增刊第四辑，1992.

The Great Man in Parnassus and Mind

——on Tao Yuanming and Du Fu Affected by Confucianism

BAI Binbin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ao Yuanming and Du Fu are both marked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Although their styles in poetry are quite different, their thoughts stem from their life and are influenced deeply by Confucianism. They lived and practiced unswervingly with great dreams, personalities and compassion. Great mind makes great poet, and great poets makes great poems. Tao Yuanming and Du Fu not only move thousands of readers by their works, they also bring benefit to the posterity by their profound Confucian accomplishment. They are two great men in Parnassus and mind,

Key words: Tao Yuanming, Du Fu, Confucianism, Compassion

(责任编辑 白俊骞)(责任校对 郭玲珍)(英文编辑 何历蓉)

